

# 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

叶文振

[摘要]本文在综述中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生育行为与婚姻发展关系的三个假设:1)孩子更多地发挥父母婚姻关系稳定器的功能;2)孩子不仅直接作用于父母婚姻关系,而且还产生间接影响;3)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父母本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分析结果基本上支持这些理论假设。同时还发现,与西方一样,生育男孩和多子女具有更大的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在高知和高职业家庭,孩子对婚姻质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加大,而在高收入家庭,孩子维系父母婚姻的作用更加突出。

[关键词]生育行为;婚姻关系;社会经济特征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80(2002)08-0061-04

对生育行为与婚姻发展的关系,中西学术界都做了不少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二元说,即生育既有利于又有碍于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生育对夫妻关系的正面作用主要是孩子的婚姻纽带功能,而对婚姻的负面影响则是孩子在家庭内部客观上充当了“第三者”,他(她)或者分散了父母的注意力,或者分享了父母的感情资源,甚至还引发父母之间的冲突。本文先简要地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利用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在厦门经济特区举行的一项关于生养孩子成本与效用的抽样调查资料,深入分析生育行为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在西方,相关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学科角度来研究生育与婚姻关系的。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尔为首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婚生孩子是父母婚姻的特有资本,孩子生得越多,积累的婚姻资本越大,婚姻所拥有的价值也越高,中止婚姻关系的成本或损失就越大,因此,婚生孩子具有直接稳定婚姻关系的作用。心理学者主要从情感代价角度分析孩子与父母离婚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家 Levinger(1976)在对离婚进行回报和代价比较分析时,把父母对未成年孩子的亲情作为重要的心理成本,认为这一情感代价是父母离婚的重大障碍之一。与没有孩子的婚姻当事人对比,身边有未成年孩子的夫妇往往在离婚问题上显得比较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她)们担心家庭解体给孩子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孩子带来的家庭乐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婚姻上的不幸福,最终是孩子成了他(她)们继续留在婚姻关系中的主要原因。西方社会学者是孩子与父母婚姻稳定关系研究的主力军。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他们更多地通过孩子与婚姻质量关系的分析间接地估计孩子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Aldous, 1978);另

外,他们还把许多学术注意力放在分析孩子的年龄、性别和胎次以及生育规模等如何制约婚生孩子对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尽管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孩子会客观上借助父母对孩子的依恋和责任,为婚姻凝聚力的增强提供一个情感和伦理基础(Morgan, et al.1988),但许多社会学研究也证实,孩子不利于婚姻生活品质的提高,甚至还会降低对婚姻关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进而影响婚姻关系的持续发展。究其主要原因:1)孩子占用有限的家庭资源,特别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至最后一个孩子离开家庭的时期内,父母角色与婚姻角色争夺家庭的时间和情感“财产”(Aldous, 1978);2)孩子会使已婚妇女感到在婚姻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孩子使她们要过多地承担家务事和照顾孩子,以及丈夫通常不能按照她们的期望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已婚妇女越是在婚姻关系中感觉到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其婚姻满意度越低,越会对婚姻关系的持续发展失去信心(Kathev et al, 1994);3)抚养孩子会增添父母的财政负担,引发与家庭经济拮据有关的夫妻争吵和冲突;4)多胎生育家庭还会因为培养教育孩子理念和方式的性别差异而在夫妻之间导致分歧与矛盾,影响婚姻关系的和谐和稳定。但是,从生育的规模来看,大多数西方研究都证实,多育会起到降低父母离婚概率的作用(Thornton, 1977a)。在西方研究中,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孩子的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在不同的分析中,年龄制约的程度和方向却差别很大。最后,孩子对父母婚姻关系的影响还会因性别而有所不同。西方大部分的相关研究结果都表明,与女孩比较,男孩具有更显著的降低父母婚姻破裂风险的作用。

与西方相比,我国学者对生育行为与婚姻稳定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几个有限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具体调查城镇生育意愿或目的时,间接地了解生育对婚姻的

[作者简介]叶文振(1955-),男,厦门大学经济系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经济学与人口社会学。

作用。但是,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表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在湖北丹江口市农村,对“生育是为了增进夫妻感情”这一问题的选答比例高达21.7%,居各生育目的的第二位,但在湖北的其他农村地区该比例则不及2%(辜胜祖等,1988)。湖南农村的调查发现,孩子是否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发展还取决于婚姻当事人的年龄。如在选答“巩固夫妻感情是生育目的”问题时,30—59岁年龄组的选答率不到4%,而30岁以下的被调查对象的选答比例上升到16%,即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间接地肯定孩子对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方向新,1992)。

以上中外相关研究的简单综述说明,西方学术界虽然在这一领域作了大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学术借鉴,但是,他们较少考虑到婚姻家庭文化背景的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在借用西方研究成果时,要特别注意其文化的局限性,避免低估我国的生男文化以及传统的家庭分工观念对孩子稳定父母婚姻关系作用的制约能力。另外,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生育行为不同特征,如孩子数量、胎次、性别和年龄等对父母婚姻关系的影响,较少把学术兴趣放在分析父母自身的经济社会背景对孩子这种婚姻影响的控制作用。而我国的调查研究结果已表明,父母的自身特征所形成的制约还是相当显著的。最后,西方学者在研究孩子对父母婚姻关系的作用时,比较注意分析二者关系的内在结构,即解释孩子是怎么影响父母婚姻发展的,这提醒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估计生育行为和父母婚姻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而且还要深入探讨孩子是通过什么样的内在影响机制作用于父母的婚姻发展。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三个理论假设:

1) 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育既是婚姻家庭社会功能的主要组成部分,又是婚姻家庭建构和延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赞成费孝通教授(1936)的“婚姻三角形”理论,即在一般意义上讲,中国孩子更多地发挥父母婚姻关系稳定器的正面作用,孩子的婚姻效用大于婚姻成本。

2) 不论是孩子的婚姻效用,还是孩子的婚姻成本,都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直接的婚姻效用和成本,二是间接的婚姻效用和成本,换句话说,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间接的,即通过孩子的其他效用和成本影响父母婚姻关系的发展。

3) 孩子对父母婚姻的影响应取决于父母本身的社会经济特征,对于高文化、高职业和高收入的“三高”夫妻来说,孩子所构成的婚姻成本相对比较高,因为他们更注重婚姻生活的质量和对婚姻关系的感情与时间的投入。

##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资料来自1996年在中国厦门经济特区举行的关于“孩子成本效用”的抽样调查(叶文振,1998)。通过厦门公安局借助电脑户口资料库随机抽取的调查样本由

1024对夫妻组成,他(她们)分别有一个0至16周岁的孩子。入户调查问卷分三大部分,共71个问题。问卷的第一部分是了解被抽中的孩子家长的个人背景和相关的家庭情况,包括父母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文化程度和职业状况;家庭人口规模、孩子的年龄和性别、夫妇的平均月收入等。第二部分用22个问题调查孩子的抚养成本,其中,包括孩子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生理成本、心理成本和婚姻成本。问卷的第三部分重在收集生养孩子的效用,如孩子的经济效用、保障保险效用、心理效用、婚姻家庭效用和父母自身发展效用等。

从被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文化与职业分布、以及家庭收入水平来看,29岁以下的占12.1%,30至44岁的占74.5%,45岁以上的占13.4%,夫妻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5和37.9岁;18.8%的调查对象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以下文化背景的占25.1%;专业行政工作人员占32.1%,个体商业者占26.6%,其余是工人农民和其他职业者;家庭月收入十分接近于正态分布,其众数落在1000元至1499元之间,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家庭占16.4%,高于3000元月收入的家庭为11.8%。另外,从调查对象的生育状况可以了解到计划生育文化在厦门的影响程度,在样本人口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占77.1%,而两个以上多胎生育的比例不及3%。

本研究主要采取比较分析法和单因素影响分析法,前者用来了解孩子的婚姻效用和成本,后者则用于分析父母自身经济社会背景对孩子的婚姻影响的制约作用。

## 三、结果与分析

### 1、孩子的婚姻成本。

孩子的婚姻成本是指孩子对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婚姻生活质量的消极影响,它主要表现为夫妻对孩子教育等问题的看法不同引起的冲突、配偶的感情和注意力向孩子转移以及夫妻单独相处时间的减少等。抽查结果表明,中国孩子的直接婚姻成本相对比较小,平均每20个调查对象中只有一个感到生养孩子不利于维持夫妻关系(见表1)。但是,其间接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孩子的间接婚姻成本主要是通过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和家庭经济负担形成的。

表1 生养孩子的主要成本(多选):1996

成本构成	比例(%)
①心理压力	56.21
②经济负担	55.78
③机会成本(妨碍工作和休闲)	26.39
④生理影响	10.70
⑤影响夫妻关系	5.28
⑥其他	14.41

另外,当我们继续分解孩子的婚姻成本时,发现生养

孩子给父母婚姻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见表 2):

表 2 生养孩子和夫妻关系(多选)

项 目	比例 (%)
①对孩子教育等问题的看法分歧引起冲突	37.23
②配偶的感情和注意力向孩子转移	19.83
③减少夫妻相处的时间	12.27
④影响婚姻生活质量	3.14
⑤其他	27.53

1) 来自孩子教育的影响。在调查对象中,有 37%承认配偶之间的争论和冲突部分是源于双方在培养孩子方式或价值取向方面的不一致。生活在厦门的母亲和我国大多数母亲一样,比较习惯设身处地站在孩子的立场上,理解孩子的内心想法和需求,因此,也比较体谅孩子的处境和压力,更多地给予宽容和鼓励。而厦门的父亲也和我国大多数父亲一样,通常从客位的角度看待孩子,要求比较严格,方法也比较简单粗暴,一旦孩子学习不理想,就过多地指责孩子不够专心和努力。再加上现代社会为男人提供了更多的户外竞争和发展机会,男人属于社会、市场的时间增加了,留给家庭的时间就相应减少了,教育孩子、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的具体任务基本上落到母亲头上。男人对孩子的学习过程了解不多,提供的帮助也不多,而且还比较少就孩子教育问题与妻子进行必要的沟通,自然无法在教育培养孩子方面协调好夫妻的合作关系。

2) 来自感情转移的影响。有了孩子后,妻子的感情会不会转移?妻子会不会在关爱和照顾孩子过程中,而有意无意地冷落和忽视了丈夫?调查表明,有 1/5 的调查对象承认生育以后,把注意力和感情转向了孩子,亲子关系分散了本来专门用于发展婚姻关系的情感资源。

3) 来自时间配置的影响。我们对每天有限的 24 小时大致是这样分割的:A.用于必要的休息和睡眠;B.给予社会和市场的;C.给予自己的,如个人的继续教育;D.给予孩子的;E.给予进一步发展夫妻感情的。A 项是满足生理的需要,基本上是一个常量,是不可或缺的;B 和 C 项也必不可少,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它们的长度和在每天总时间中的比重都会继续增加;在剩下的两个时间构成中,给了孩子多了,夫妻独处时间就少了,自然会影响夫妻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在我们的样本中,平均每百个调查对象中就有 12 个感受到孩子对夫妻相处时间的侵占。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生养孩子会给夫妻关系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最终,绝大多数厦门人都认为,并不因为养育孩子而降低婚姻生活的质量。

## 2. 孩子的婚姻效用。

孩子的婚姻效用是指孩子在稳定和发展夫妻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为了深入了解孩子的婚姻效用,在调查中,我们首先询问厦门父母,“您认为生养孩子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在表 3(略)通过对调查对象选答结果比较,我们间接地发现,在厦门父母的心目中,孩子的婚姻效用还是比较明显的,选答“生养孩子会增进夫妻关系”的比例与选答“老有所靠”的比例并列第 5 位,约 30%的调查对象肯定孩子有利于父母婚姻关系的发展。与前面讨论过的孩子婚姻成本相比较,把孩子作为增进夫妻关系的正面效用的选答比例显然要高得多,大约是前者的 5.6 倍(29.40%/5.28%),说明抚养孩子给我国婚姻关系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正面的、积极的。

另外,我们还在调查中直接了解调查对象是如何理解孩子的婚姻家庭效用的,并就此进行三个层次的分析。首先,我们在调查中询问当事人,“您认为孩子对婚姻家庭生活有积极作用吗?”选答结果显示,93.3%的样本人口持正面回答,即婚内育有孩子对婚姻关系具有积极作用,认为没有积极作用的仅占 6.7%。这跟前面提到的很低的孩子婚姻成本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我们又让调查对象指出孩子对婚姻关系发展的具体效用,选答结果显示在表 4(略)上。其中,认为孩子会增加夫妻共同关心的话题、会密切夫妻关系和体现婚姻幸福的比重分别达到 69.2%、55.6%和 48.1%,分别居各种婚姻家庭效用的第二、三和四位,这说明,即使在当代中国人的夫妻横向关系上,孩子的积极作用仍然是十分显著和重要的。另外,孩子对家庭的结构性效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着孩子对父母婚姻关系的正面影响。如居各种婚姻家庭效用首位的是使家庭生活结构完整,选答人数占样本总数的 82.7%,平均每十个调查对象中就有 8.3 个把有没有孩子作为家庭生活结构完整不完整的重要指标。而且在对比孩子的婚姻效用和孩子的家庭效用时,我们还发现,调查对象表现出重婚姻效用、轻家庭效用的趋向,更多地把亲子关系和夫妻横向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强调孩子对稳定婚姻关系的重要作用,说明在婚姻稳定性容易受冲击的今天,孩子对婚姻关系的传统作用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最后,我们还问调查对象,是否不要孩子或者通过其它方式也能获得以上这些婚姻效用,以了解孩子婚姻效用的替代性。有趣的是,对该问题持否定态度的比重竟然高达 88.5%,平均每十个厦门父母当中大约只有一个肯定孩子婚姻效用的可替代性。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结论,如果中国人想结婚的话,就一定会要孩子,婚姻行为和生育行为的这种不分割性不仅取决于孩子使传统的家庭生活结构完整,而且还有利于稳定婚姻关系。

此外,孩子的其它效用,如增加家庭乐趣、事业有成给家庭带来荣誉和使父母为之而感到骄傲、增强为人父



母的责任感以及促使父母亲更加成熟和富有爱心,也都会为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提供心理道德层面的支持。

### 3、孩子的数量、性别与生育的婚姻效用。

表5(略)是按孩子性别、数量分组的孩子婚姻效用。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一样,我国男孩的婚姻效用也比女孩的婚姻效用大,从选答结果来看,前者选答为16.4%,约是后者6%的近3倍。但是,由于近20多年来计划生育文化的持续宣传和实践,中国父母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以,大多数调查对象并不认为孩子的婚姻效用会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选答“相同效用”的比例高达77.6%。

从调查中,我们可以得知生育规模与孩子婚姻效用的关系。尽管一半左右的调查对象认为孩子的婚姻效用不会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相应的变动,但另一半的选答却和西方的分析结果很接近,即多生孩子更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说,多生和生男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生育主体婚姻关系的稳定。

### 4、孩子婚姻成本与效用的制约因素。

在分析中,我们把文化程度、职业性质和家庭收入作为调查对象社会经济背景的主要测量指标,并通过各指标的分组比较,观察这些制约因素与孩子婚姻成本效用之间的关系。表6(略)对孩子婚姻成本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对于高文化、高职业和高收入的“三高”父母来说,孩子给他们带来的婚姻成本要比“三低”的父母大,或者说,孩子的婚姻成本是和孩子的教育水平、职业层次以及家庭收入成正比关系。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父母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层次对孩子婚姻成本的正向制约。高文化、高职业的父母最容易因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不一致而发生冲突和争吵,对配偶向孩子转移感情和注意力的抱怨也最多,也更在意抚养孩子占用了他(她)们夫妻独处的时间。其中,高文化、高职业父母为孩子教育而发生的冲突比“双低”的分别高出15.3个百分点(47.3%-32%)和15.1个百分点(50.9%-35.8%),“双高”对感情转移的抱怨比“双低”的分别超出11.2个百分点(31.6%-20.4%)和7.8个百分点(29.3%-21.5%),“双高”对时间占用的介意分别高出“双低”的12.1个百分点(23.7%-11.6%)和8.6个百分点(20.4%-11.8%)。另外,和“三低”调查对象几乎不认为孩子会影响婚姻质量的情况相反,分别有66%和7.6%的高文化、高职业的调查对象坦言孩子对婚姻关系的负面效应,认为孩子会影响婚姻生活质量的比例也随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层次的提高而相应向上浮动,呈现出正相关的变动态势。

表7(略)罗列的是按父母文化、职业特征和家庭收入水平分组的孩子婚姻效用。首先,孩子的婚姻效用与家庭收入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

孩子的婚姻效用也越大,特别是孩子的婚姻纽带作用和婚姻幸福体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表现出更显著的差异,高收入的要比低收入的分别高出11.5个百分点(61.3%-49.8%)和10个百分点(51.3%-41.4%)。其次,从职业性质来看,专业、行政工作人员的孩子婚姻效用要大于非专业、行政工作人员,而在于工人农民以及个体商业者之间,孩子的婚姻效用没有大明显的差别。最后,孩子婚姻效用的文化程度分布是非直线的,孩子婚姻效用最大的是落在初、高中文化这一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次之,小学以下的孩子婚姻效应最小,而且大小的落差很大,选答增加夫妻对话的相差为15.1个百分点,强调幸福婚姻体现的相差为12.3个百分点,突出密切婚姻关系纽带的相差相对小一些,约为9个百分点。

### 四、结语

本文利用厦门孩子效用与成本的抽查资料,对生育行为和婚姻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探讨,分析结果基本上支持我们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概括起来,我们从研究中至少得出以下关于我国婚生孩子与父母婚姻关系的几个结论:

1) 我国孩子的婚姻成本明显低于婚姻效用,说明在一般的情况下,生育行为有利于婚姻关系的发展和稳定。特别是相当低微的我国孩子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体现了我国与西方有别的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互动模式,我国孩子尽管也象西方孩子一样会引起父母意见分歧和冲突,消耗本可以用于父母发展更新夫妻关系的时间、情感 and 精力,但这种负面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和延伸,以至于降低父母婚姻关系的质量。

2) 与西方一样,生育男孩和多胎生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大的稳定我国婚姻关系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和进步,特别是在计划生育和新婚家庭文化的影响下,生男与多育所表现出来的婚姻效用会逐步减弱。

3) 夫妻文化程度、职业层次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既加大了孩子的婚姻成本,但同时又提升了孩子的婚姻效用,二者互相抵消后,似乎并没有明显地改变生育行为与婚姻发展之间的关系性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婚姻当事人文化水平和职业层次的上升而出现的婚姻质量下降的事实可能预示着,当人们在自我发展和提升中不断增强婚姻质量意识后,孩子的婚姻成本会随之扩大,其负面影响还会渗透到婚姻关系的深处,动摇婚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此外,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婚姻效用显著加大也可能隐藏着一个事实,孩子被父母作为一条血缘的纽带,去捆绑一个不幸福而且无望改变的婚姻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要引起注意和努力予以克服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系,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林庄)